



第九辑

苏联问题译丛

一九八一年 第二辑

苏联问题译丛

(第九辑)

《苏联问题译丛》编辑部编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苏联问题译丛

(第九辑)

《苏联问题译丛》编辑部编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787×1092 毫米32开本 11.75 印张 239,000 字

1981年7月第1版 1981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600

书号 17002·53 定价 0.98 元

(只限国内发行)

目 录

政 治

- 何谓社会主义** [日]菊地昌典(1)
斯大林秘书巴扎诺夫回忆录 [苏]巴扎诺夫(32)
掩盖历史真相就是对人民犯罪 [苏]И·格里戈连科(66)
评勃列日涅夫的三篇回忆录 [苏]阿夫托尔罕诺夫(100)

苏联教育 [苏]A·科林(114)
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苏联国民文教事业
的发展 [苏]B·H·乌沙诺夫(136)

经 济

- 二十年代的党内斗争与苏联经济模式的形成** (151)
斯大林时代以后苏联经济学中互相斗争
的思潮 [美]阿隆·卡斯登尼林布埃根(183)
评尼·阿·沃兹涅先斯基选集 [苏]M·萨柯夫(202)
苏联的经济改革 (212)
现阶段苏联社会的经济发展的理论
问题 [苏]И·H·费多谢耶夫(314)

国 际

- 论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国家 [苏]P·乌里扬诺夫斯基(335)
苏联对第三世界的政策 [美]罗杰·卡奈特、拉贾·梅农(350)

何谓社会主义*

〔日〕菊地昌典①

寻求社会主义的真正形象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察，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这是《共产党宣言》中开头的一句名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充满信心地向全欧洲敲响了共产主义即将出现的“警钟”，并嘲笑了被这个幽灵吓得胆战心惊，同时千方百计地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绞尽脑汁的欧洲统治阶级。

现在，威胁世界统治阶级的幽灵究竟是什么呢？或者说应该是什么呢？在《共产党宣言》发表后只经过了六十五年的时间，就在欧洲的一角诞生了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新国家。这

* 《何谓社会主义》一文是摘译自《探讨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理论》一书中的第一、二部分，根据摘译部分的内容，译者标题为《何谓社会主义》。

① 作者菊地昌典是日本东京大学教授，专门从事苏联政治史和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曾在莫斯科大学留学，多次访问中国和南斯拉夫，还访问过捷克、越南和朝鲜等国，写过许多论述苏联政治和社会主义理论的著作，其中有《作为一个历史时期的斯大林时代》（1972年）、《论现代苏联》（1977年）、《探讨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理论》（1976年）和《面临考验的社会主义》等著作。——译注

个国家的名字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然而，现在对这个所谓正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国家仍然抱有《共产党宣言》中所呼叫的那种恐惧的人并不多了。与此相反，对实际上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状况抱疑惑和否定态度的人更多了。仅仅经过了一个世纪多一点的时间，曾经徘徊于欧洲，甚至徘徊于世界的这个可怕的幽灵似乎已经消失，现在人们把美苏并立起来作为一个焦点在公开地议论着，社会主义正在被当作从发展中国家走向先进国家的一种形式。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样的问题又重新提出来了，社会主义国家不可避免的弊病也正在暴露出来。

共产主义曾经使统治阶级感到可怕，被压迫阶级曾把它当作救星。现在的情况怎样呢？幽灵消失了。徘徊的不是幽灵，而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精神感到惶恐不安的人为数不多，而且都是一般的市民，他们所恐怖的却是现有社会主义国家所存在的集中营、压制民主、官僚制度的统治和丧失自由的忧虑等。

不管是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的都是人，都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不满，赤手空拳奋起要推翻他们的权力机构，是人民群众行使自己的神圣权利。压制人民行使这种权利的国家绝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冒名的社会主义，而且是比资本主义还要坏的国家政权。为了确立这样一种认识，大概需要坚决维护真正的人民主权的立场。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的在于解放人类的话，那么与实现这种解放背道而驰的体制或政策就应该受到人民的毫不留情的批判和谴责；而马克思主义集团如果缺乏一种能够充分接

受人民的意见和进行自我批评的谦虚精神的话，那么只能说他们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进行招谣撞骗。

我认为，社会主义首要的是尊重人的生命。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和计划经济的实施等问题，都是要在尊重生命的前提下，才能予以肯定。

一党专政如果离开了人民的监督，很快就会变成镇压人民的机构。这个时候，所谓一党专政归根结蒂就会成为一群谋求升官发财的人维护自身利益的最好的工具，国家就会出现异化，成为镇压人民的机构。

我的结论是简单的。那就是，归根结蒂就是社会主义如何才能消除固定不变的政权不可避免的腐败、堕落或反人民的性质，如何才能实现一个平等的社会，也就是说，如何建立一个既能消灭三大差别，又能保障物质丰富的社会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所谓社会主义也就是一个动态的人民运动的整个过程，即社会主义始终存在着需要进行持续斗争的一面，要不断地同政权不可避免地出现的腐败现象进行斗争，在这同时，要解决争取人类彻底解放的问题。

人类总是在追求彻底的解放，这一点与社会主义本来的精神是一致的，所以社会主义才能成为人类的希望，这是我对我对社会主义抱有信心的依据。如果这个社会主义给人类的彻底解放泼冷水，它就不能称为社会主义。

当然，有人认为，不可能具体指明实现至福王国的人类最后解放的日子，而且为实现这种社会本身就是一种幻想。这种看法正确与否，姑且不论，但是，不论怎样，实现这种社会的里程应该说是问题的焦点。如果社会主义的目标是要彻底消

灭资本主义的人的异化的话，那么怎样才能清除资本主义的丑恶部分呢？必须提出具体的措施和方法。然而，至少现有的社会主义却忘记了对这一过程及其方向的重视，只是通过夸耀现有社会主义的完美性来散布虚伪的幻想。

本来，社会主义是一个能够保证人民的生活不仅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也比资本主义远为丰富和内容充实的世界。不，应该说它的着重点与其说是在物质生活方面，不如说是在精神生活方面，只有这样，以创造性和主动性为基础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因此，在实现这种社会之前的过渡阶段，首先其方向性和具体性是重要的。然而，至少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由于它急于获得物质优势，而更重要的精神生活却遭到政权的束缚，向本来应该是社会主人翁的劳动人民封锁消息，把他们变成只关心物质生活的脱离政治的人。

无产阶级专政不仅要谴责资产阶级，而且要谴责那些表面上似乎是劳动人民的代言人，而实际上却是一帮吞噬人民利益，通过掌握国营企业或公有制的企业来中饱私囊的党官僚和行政官僚，并制止他们的这些行为。特别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已变成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如果不把党本身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这个国家实质上就变成了与整体主义国家无任何差别的国家。因此，无产阶级专政本来就不是一个从政党的角度去谈论的问题，而应该作为一个由掌握主权的劳动人民行使自己正当而又神圣权利的问题来考虑。

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起的作用是巨大的。正因为如此，

当共产党没有能力成立一种机构来抑制其本身的腐败和颓废的时候，这种腐败和颓废状况就会无止境地、迅速地蔓延开来，并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野心家纷纷钻进共产党，在党内结成派系，成为官僚根深蒂固的帮派。这种情形恐怕跟我国现在的保守党的情况没有什么两样吧。他们是人民群众选出的尖子，人民群众只不过是驯服的羔羊，听从他们的意旨。这样的社会不能称为社会主义。

这样的社会是新生的“资本主义”，尽管生产资料国有化了，但实际情况与资本主义没有丝毫不同，甚至可以说比资本主义还要坏。我在思考社会主义的时候，为什么要执拗地提出保证民主的问题呢？理由很简单。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些人的意见如果触犯了当权者（当然，实际上很多情况是共产党本身）的利益，动摇了他们存在的基础，这些人往往就会被当作反革命，即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被判罪。正如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知识分子走过的艰难历程所表明的，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些人要坚持自己的意见，比在资本主义的日本难得多。

我认为政权腐败，绝对的政权绝对的腐败这句话是真理。任何革命政党都不能置于这一真理之外。问题是如何把这种无法避免的腐败，换句话说，如何把脱离劳动人民、异化于劳动人民，最终变成镇压劳动人民的国家机构时刻置于劳动人民的监视下，如何找出防止腐败的方法，这是唯一的道路。几乎不能指望党自己能够使这种腐败和颓废相对化。因为社会主义既然是共产党专政，那么在共产党内部就无法成立一种有效地防止腐败的机构，因为他们在共产党内的利害关系完

全是一致的，而且党通常是由谋求升官发财的人所控制的。

劳动人民解放的程度

对于我的上述观点，自然会有人批判我是站在人性论的立场，对社会主义作了过头的评论。但是，只要追溯一下斯大林时代的历史性悲剧以及匈牙利事件和捷克事件等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叛乱的历史，就不能不看到少数人的意见，而且是正确的意见如何遭到压制，最后矛盾终于爆发，出现了最坏的情况，那些人又是怎样被当作反革命遭到残酷镇压的事实；同时不能不承认这种情况已成为一种规律普遍地存在着。只要不出现上述悲剧，就几乎不能设想政府或党的领导会引咎辞职。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情况。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发生的中国的天安门事件也可认为是其中的一例。《人民日报》把这个事件作为“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作了详细报道。从报道可以看出，天安门事件的确是一起重大的事件。但是把它定为“反革命”事件是值得怀疑的。然而，这次事件没有导致武力镇压，应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

有人认为，现有社会主义国家在爆发革命当时，都是殖民地、附属国，或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还没有建立起市民社会，因此，还不具备行使市民各种权利的成熟的历史经验，这种看法仅就历史角度来说，是正确的。但是，现在用这种情况来说明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它们进行批判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既然提出这种论点，就应该从理论上论证为什么最先进的社

会主义革命会发生在后进的国家。我认为，在考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化时，必须正确地吸取包括苏联社会主义六十年历史在内的现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种种经验，这是非常必要的。

为了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病，就产生了对社会主义的幻想，正是这样的幻想在日本普遍地存在着。因此，出现了忽视已在日本社会得到保证的市民权利的现象，反而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市民的这些权利会得到顺利发展，并受到社会主义政权的保护和支持。这种看法比人们估计的要强烈。人们曾经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同资本主义相比较来作说明，认为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和公有化将刺激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认为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能够在极短的时间里，使其生产力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但是，目前尚未成为现实，不仅如此，实际情况是，在一部分社会主义国家，早就明显地出现了经济停滞，国家一直为提高工人的生产积极性而煞费苦心。

同样，在不关心政治的倾向日益增长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市民的各种权利也必将不断缩小。也就是说，市民每一个人的政治觉悟不应该是靠国家的命令或奖励制造出来的，市民的权利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不断加强。而且必须认识到，人民的监视和控制稍微放松一点，社会主义政权就将腐败、颓废，甚至堕落为反人民的政权。

本来，所谓社会主义的民主并不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后就能应运而生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是经过漫长的岁月，在资本主义严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同样，社会主义的民主也只能

由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每一个市民通过为争取权利而进行的自觉的斗争和对社会主义政权进行严厉批判的过程中才能产生。可是，由于统治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权和政党自称是社会主义，问题就复杂化了。因为对政权进行批判就会被扣上反社会主义的罪名，甚至还有升级为反革命的危险性。换言之，正因为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为扩大市民权利而进行的斗争及其真正的价值才能得到检验，并通过这种斗争使社会主义政权本身也得到检验，证明这个社会主义政权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现在担心的是，有不少人用社会主义革命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截然加以区别，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市民获得的种种权利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权机构赐予我们的，从而对这种权利加以轻视。事实并非如此，市民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所获得的种种权利是靠我们自身的力量，通过不断斗争获得的。而且，这种扩大权利的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也要不断地继续下去。可以说只有深入地、大规模地开展这种斗争，才能寻求到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内容才能得到充实。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市民运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之间有着延续性，日常的市民运动是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充实社会主义民主的内容。必须根据这种观点，为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化作好准备。如果把扩大和加强社会主义国家里市民的各种权利作为一种不言自明的道理，实现多党制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提到的作为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工具的警察和军队等实现彻

底的民主化也是理所当然的了。在这种情况下，市民本身应该起到监督和控制的作用，这是当然的前提。

自批判斯大林以来，我们常常说，从我们自身的角度出发，重新研究现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是很重要的。可是，在这二十年间，可以说根本就无法肯定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成果。与此相反，轻视现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宝贵实践，认为现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一些不发达国家，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化没有多大参考价值，这种看法逐渐占了主导地位。这种轻视前人为革命而艰苦奋斗和流血牺牲的崇高精神的思想本身就是轻视历史，有这种思想的人必然也会同样轻视本国经验。

我认为，在分析社会主义时，不应当把计划经济和实现生产资料国有化和集体化的程度作为衡量社会主义的标志，而应该看社会主义国家劳动人民获得多大程度的解放，他们在工厂和集体农场的经营管理方面有多大的发言权。换句话说，甚至可以说必须从劳动人民获得解放的程度来重新衡量社会主义国家。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中出现了疏远苏联的现象，这是必然的。现在，难道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还会渴望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期望实现那种社会主义吗？苏联对斯大林的清洗也无法进行总结，还在为侵捷事件辩护和镇压国内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不可能憧憬这样的国家。因为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实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不是前进，而是倒退。

社会主义各国的经验极其清楚地说明，仅仅靠一次社会

主义革命和作为其结果的社会主义政权的实现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这一事实就彻底打消了人们过去对社会主义的幻想。而且，这种政治革命和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只不过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一步，要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显然还必须有一个彻底变革人类的漫长过程。

我为什么要反复阐明这种当然之理呢？至少是因为映入我眼帘的发达国家的共产党长期以来对于苏联实在过于屈从了。自从批判斯大林以来，在深入开展对斯大林的批判方面究竟做了些什么呢？捷克事件发生的时候，表明和采取了什么样的自主性呢？在中苏对立中又是持什么态度呢？对苏联镇压持不同政见者提出过抗议没有呢？在批判斯大林以来的二十年里，发达国家的共产党所表现出来的动摇、沉默和屈从的事例数不胜数。

社会主义的道路通向遥远的将来。以仅有六十年社会主义经验的苏联为中心来进行议论可能是极其错误的。但是，中国和南斯拉夫正在把苏联作为反面教员，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正在努力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这些尝试能否成功我现在还无法下结论。也许还会出现另外的国家，又来批判南斯拉夫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并把南中两国作为反面教员，试图建立起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国家。这虽然是一种假设，但是，用这种长远的眼光来考虑社会主义不是有益吗？

“革命”与“改良”的争论收效无几

我们生活的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因而具体揭露资本主

义的弊病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我们可以很自然地认识到资本主义体制本身带来的种种弊病和矛盾，也就是起因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种种弊病。今天，所有的革新政党，甚至执政的保守政党谈论资本主义的弊病已经是司空见惯了。关于资本主义的弊病随时都可以列举几十条。但是，至于如何解决资本主义的这些弊病，众说纷纭，各持己见。这些意见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主张逐步改良资本主义；另一类是主张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世界上常常围绕着走革命的道路，还是走改良的道路发生的争论就与上述两类不同的意见有着密切的关系。既然生产资料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就必须采取某种形式将私人拥有的生产资料变为国有化，或公有化，往往就是这样简单地提出这个公式。而且，“革命”论者强调暴力是必须的，革命是必要的。当然，持这种观点的人对历史经验的学习要比改良论者深入，因为至今在历史上还没有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先例。翻开现在被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各国历史，就可以看到这些社会体制的大变动都是与战争和革命相关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爆发了俄国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又诞生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在论述革命的时候，首先应该注意到革命同战争的关系。

南越和柬埔寨的情况也应该属于这个范畴。原因是战争常常造成使人民遭受无法忍受的极其悲惨的绝境，人民为了摆脱这种状况，在死亡线上争取生存的欲望便成为一种巨大的动力，从而产生了采取革命行动的强烈愿望。暴力革命否定论者完全不理解人民群众的这种要求革命的愿望，不理解

人民走向愤怒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是采取反战或不战这种思想意识已系统化了的明确态度。人民群众的要求是非常直接的，不愿意等死，要生存，要面包等纯朴的，然而又是迫切的要求成为他们采取革命行动的基础。当国家政权用暴力镇压人们而使这些要求宣告失败的时候，一直被压抑的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就会爆发出来。所以不能仅仅从“暴力”这一个方面去认识革命，还要从时间方面来考虑暴力的发展过程。否则不仅不能正确地理解革命的力学构造，而且会错误地理解“革命”与“暴力”之间的关系。过去有关“暴力革命”的争论，之所以不能跳出抽象概念的圈子，而总是把问题局限于否定“暴力”这一点上，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下功夫把革命的本来面目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去认识，甚至可以说，从他们对“革命”的这种认识中，可以看到他们对民主的观点。革命不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就不可能成功。革命和政变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此。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对人民群众所进行的革命是以民主的名义予以肯定呢，还是予以否定。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暴力革命论者偷梁换柱了。

对于人民群众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为了争取生存而爆发出来的行为，是支持，还是采取否定的态度，这是问题的实质。但他们故意把这个问题抛在一边，把人民群众爆发出来的革命行动说成是只是在没有民主的社会才会发生的现象，并认为这样就可以在如何评价革命的问题上不用明确表态。现在有不少人在玩弄这种欺骗的手法。站在革新立场的人也不例外。革命作为历史的事实已经出现过，今后仍将出现。对于事实，不能从主观出发，而只能正视它，并明确表明自己的态

度。把问题简单地归结为“暴力”和“流血”也是不符合实际的。翻开革命的历史就会知道，流血总是由于国家政权对奋起的人民群众实行血腥的反革命镇压而造成的。如果由于反对流血而指责人民群众为争取民主而进行的革命的话，那就意味着要人民群众永远安于非人的状态。当前，在有关暴力革命的论战中，最需要的是重新认真地学习革命史。

要以谦虚的态度，通过具体的事实在学习人民群众被迫拿起武器进行斗争的历史过程，这种学习也是对我们自己的民主观点的严格检验。只是抽象地肯定或否定暴力，争论是不会前进的。为了使争论有所成效，首先应该清楚地了解具体的革命史，并认清人民群众在其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客观地认识到包括我们在内的人民群众在我们生活的社会中的历史作用，才能切实体会什么是民主这个问题。当然，应该尽量避免暴力，但不能绝对保证非暴力能够战胜暴力。以印度甘地老先生为首的非暴力主义并不是仅仅意味着不使用暴力，许多非暴力主义者不畏强暴，通过他们勇往直前的行动和自我牺牲的行为，成功地把国家政权的丑恶本质暴露在人民群众面前，这是一种英勇的尝试，是用非暴力揭露国家政权赤裸裸的暴力面目的勇敢的自我牺牲的行为。那是在非暴力的名义下进行的一种具体实践，决不是无所作为和逃避现实。我认为，平常说的用非暴力对付暴力这句话也需要重新研究，也就是说要弄清楚历史上的非暴力主义为什么非常勇于实践这个问题，并在历史上给予正确的评价。

因此围绕着是革命，还是改良的争论，并不是表面的、社会变革方法上的分歧。如果把实现人民群众的要求看作是民